英雄史话 伟大转折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刊 1936-2026

回旋转战 策应远征

——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的长征史诗

木黄会师纪念馆内雕塑。
贾长江 摄 （影像贵州）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在贵州路线图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供图制作。
本报记者 王子琪 制图

先遣探路会师，红六军团西征到贵州

本报记者 曹雯

清晨的阳光穿过梵净山西麓的薄雾，洒在铜仁市印江自治县木黄镇那棵千年“会师柏”上。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前，参观群众自发敬献的鲜花层层叠叠。木黄会师纪念馆讲解员田芮诗告诉记者：“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6月至今，参观群众比往年明显增多。”

92年前，一支不足万人的队伍在这里，走完了长征中一段九死一生的“先遣之路”。

1934年夏，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日益陷于被动。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训令红六军团转移到湘中地区建设新根据地，与红三军取得联系。8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9700余名红军将士告别了休戚与共的湘赣苏区人民，开始突围西征。

先遣队打开入黔通道

“红六军团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后，由当地赤卫队、游击队逐步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是湘赣革命根据地唯一的主力红军。”说起红六军团，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姚媛媛告诉记者，由于湘赣革命根据地与中央革命根据地隔江相望，是其西面屏障，红六军团长期担负着保卫、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的双重任务。

红六军团接到中央训令后，退出湘赣苏区，挺进湘中创立新的根据地，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战略任务。在这次战略行动中，先是要打破敌人的重兵包围，接着要在盛暑时节进行长途远征，在此期间必将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和阻过自然界的无数险阻，且孤军深入敌区，脱离根据地作战，艰险可想而知。

红六军团开始西征后，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将陆天的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军委总部。但国民党军破译了电报，摸清了军团的行军规律，不断向军团宿营地进行轰炸，各路敌军也步步紧逼，危机如影随形。红六军团根据敌情变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驰骋纵横在湘桂黔边，使得国民党军围歼的企图数次落空。“1934年9月19日，红六军团在湖南新厂击溃敌军的两个团，毙俘敌军400余人，敌人不敢再轻易尾追。次日，红六军团进入贵州黎平县境，并控制了清水江地区。”姚媛媛说。

在苗侗村寨播下革命火种

红军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自己的使命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红六军团此次西征，在行军途中特别注重在沿途播撒革命火种、启发民众。

今天的清水江流域山青林茂，作为苗侗聚居区，这里既有碧水青山、梯田层叠的自然风光，也有苗绣银饰、侗族大歌等传承千年的民族文化，更因红军长征途经沉淀下深厚的红色底蕴。但90余年前，苗族、侗族群众对这支初来乍到的军队并不了解。因长期受反动政府和军队的欺凌，仇恨很深，每当反动军队进村，他们手持利器，扼守山寨，防被洗劫。面对这种局面，任弼时严令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各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军行所至，沿途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王宗勋曾任铜屏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县档案馆馆长，从事地方历史研究30多年。他说，1934年9月，红六军团途经隆里古城，百姓因听信国民党谣言纷纷躲进深山。红军秋毫无犯，主动帮助百姓打谷子、干农活，离开时在墙壁上写下标语。红军纪律严明、紧密联系群众，与过去军阀过境形成了鲜明对比。3个月后，当中央红军第九军团再次经过隆里时，当地百姓便敲锣打鼓出城迎接。

红军进入贵州后，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地形不熟悉。贵州是个多山省份，没有军用地图，很难确定行动方案。在黄平县旧州城，红六军团却意外收缴了一张法文版贵州省地图并巧遇外国人勃沙特，并在其帮助下翻译了这张法文地图。这张地图为红军此后转战云贵、东出湘西起到重要作用，而勃沙特随红军长征18个月，与红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甘溪遭遇战突围脱险

19.34米，既是甘溪烈士纪念碑的高度，也是时间的刻度。它标记着那场遭遇战发生的年份：1934年。主碑上，萧克将军题写的“甘溪死难烈士永垂不朽”10个大字，在阳光下苍劲凝重。碑名之下，埋藏着一场红军长征先遣路上惨烈的突围战。

那是1934年10月5日，红六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电令，从猴场改向东北前进，分两路经龙溪进入石阡河坝场等地，准备经石阡县城进入江口地区。但就在红六军团进入猴场之前，湘、桂、天黔区防军正商量如何“会剿”红军，一条纵贯南北的封锁线已然成型。

10月7日，红六军团经过石阡甘溪时，遭到敌军24个团的三面合围，部队被敌军截为三股，陷入十分凶险的处境中。为避敌锋芒，保存有生力量，军团首长决定各自分头突围去黔东根据地寻找红三军。其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红四十九团和红五十一团各一部分突围出石阡，经9天9夜艰苦转战，于10月15日在沿河铜厂坝地区与红三军会合；红五十团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于10月23日在梵净山山脚与前来接应的红三军会合。其余红军军团主力在10月16日拂晓，从朱家坝出发转移，经过十几日的艰苦奋战，于24日抵达印江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

“红军主力在甘溪战斗后，一直转战于石阡、施秉、余庆之间，与敌人周旋。这一地区人烟稀少，无法得到粮食和物资的补给，部队常常在悬崖峭壁上攀行，往往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很多战士赤脚行军作战，十分艰难。”姚媛媛说。突围中，为掩护红六军团主力转移，红十八师二十五团在困牛山战斗中近乎全部牺牲。

突破乌蒙山重围后，红二、红六军团进驻盘县、亦资孔地区。3月30日夜，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人在盘县九向楼召开紧急会议，面对“留驻南方坚持斗争”与“北上会师抗日”的抉择，最终顺应全国革命大势，确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的核心战略，彻底结束游击转战状态，锚定北上抗日的最终方向。

“红二、红六军团转战贵州，在长征史上留下厚重一笔。”毕节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宇表示，这支队伍在将自堡会师时仍保留1万余有生力量，在各路长征红军中战果突出。他们不仅有效牵制国民党重兵，极大缓解了中央红军作战压力，实现了此前中央创建川滇黔苏区的战略构想，更在甘孜会师后与朱德、刘伯承一道抵制张国焘分裂，推动红四方面军北上。红军撤离后，留在黔西北的游击队伍仍坚持武装斗争，继续播撒革命火种。

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旧址 吴剑 摄 （影像贵州）

策应中央红军，转战贵州绝地突围

本报记者 曹雯

石阡县城中心长征路，一栋百年砖木教堂建筑静静伫立，门匾上“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旧址”大字醒目斑驳。这里是红二、红六军团入黔转战的指挥中枢，在这里召开的石阡会议，作出果断的战略取舍，为这支英勇之师撕开了绝境突围的生路。

1935年11月，为突破国民党重兵“围剿”、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率领红二、红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启战略转移。1936年1月12日，红二军团攻占石阡，将总指挥部设于县城。部队原计划立足石阡、镇远、黄平创建新根据地，但国民党15个师重兵合围，加之石阡地狭粮少、地形不利，背水一战消耗惨重，部队再度陷入险境。

危局之下，红军果断应变。1月19日，军团领导人在石阡召开会议，放弃在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意挥师西进贵州腹地。这次主动战略转移，成为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路上的关键节点。

西进路上，红军以精妙战术克险破敌。乌江上游鸭池河两岸绝壁千仞，黔西大关镇丘林村的“红军渡”石碑，见证了一场渡河之战。“当年渡口仅有4只木船，一次仅能渡二三十人。”黔西市大关镇公共事务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光鸿介绍，1936年1月底，红军佯攻贵阳，诱敌收缩防务，制造乌江险役迹象，2月2日清晨，红军星夜奔袭渡口、船工闻讯划船相助。军民合作，连夜架起长100余米、宽约2米的浮桥。17万名红军将士踏桥横渡，向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挺进。

1936年2月5日，黔西会议召开，正式确定以黔西、大定（大方）、毕节为中心创建川滇黔新苏区的战略部署，落实石阡会议西进方针。2月8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大方孔庙成立，这是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建立的跨省级苏维埃政权。2月17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驻毕节百花山福音堂。

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展厅，讲解员文康介绍，依托根据地，红军全面开展建政扩红、统战拥军工作，组建近百支基层游击武装，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邀请贵州辛亥革命先驱周素园出任司令员。亲民举措深得民心，短短20余天，毕节5000余名青年参军。

根据地的蓬勃发展震动国民党当局，将介石集结五路纵队约120个团、10倍于红军的兵力大举“围剿”。1936年2月下旬，为保存有生力量，红二、红六军团撤出毕节，向安顺转移。由于国民党军队在通往安顺的道路上布下重兵，红二、红六军团放弃去安顺的计划，改向甚进险峻西秉的乌蒙山区，从3月2日至29日开启为期近一月的乌蒙山回旋战。

这个时节的乌蒙山湿冷刺骨、物资匮乏，敌军层层围堵，红军依托复杂地形、凭借灵活战术和群众支援，三进三出蚕西、迂回穿插，打赢以剿河、哲庄坝等关键胜仗。

困牛山绝唱，红军宁死不伤百姓的抉择

本报记者 黄若佩

站在石阡县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前，高山连绵、峡谷幽深，历史回声仿佛仍在崖壁间激荡。90余年前那个深秋，红五十二团以几乎全部牺牲的代价完成断后掩护任务，战斗到最后的红军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毅然集体跳崖，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红色壮歌。

这是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生死博弈和抉择。

1934年9月，奉命西征的红六军团进入贵州境内，并于10月初进入石阡地区。10月16日拂晓，石阡浪山峻岭大雾弥漫。红六军团主力从朱家坝南撤，刚越过关口大田，负责掩护的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突遭湘黔敌军迫击炮、机枪猛攻和团团伏击。

为保主力安全向南转移，师长龙云指挥部队把敌军引向困牛山。湘军唐伯貢、胡达部及龙炳民团以为发现红军主力，紧追不舍；敌军柏辉章、王天锡部分别拦截。围追之敌被拖住，困牛山上的400余名红军却陷入重围。危急时刻，龙云率200多战士从陡壁荆丛中下营盘墟到三步跳，顺河沟突围，留下阻敌红军继续激战。

困牛山，三面临河，地形险恶。前有黔军，后有湘军和地方民团，左石悬崖，四周高山被占，留下阻敌的红军陷入绝境。红军战士英勇顽强，阻击敌人的田海清团长牺牲在山顶阵地。走在敌军前面的，有很多被胁迫裹挟的百姓，红军不便展开战斗，且战且退，退到虎井沟悬崖边。

此时弹尽粮绝。拼刺刀，敌人居高临下、弹药充足，白刃战无异送死，还可能误伤夹在敌军中的百姓。红军抱定“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的决心，毅然跳下悬崖。

最终，跳崖者中只有少数被刺蓬阻挡，为当地百姓所救；而龙云率部突围后，又遭阻击，负伤被俘。敌人得知他是红十八师师长，先后将他押往贵阳、长沙、九江、武昌进行轮番折磨，但是龙云始终坚贞不屈，于1936年在湖北牺牲。

硝烟散去，但困牛山下的故事，仍在继续。

“关于困牛山战斗的记载，最早见于1934年10月19日的一份旧政权档案——《黔军军部皓电川岩坝战况通报》（困牛山属于川岩坝地境）。”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姚媛媛告诉记者，据档案记载，红军“顽强抵抗，冲锋十余次，全用肉搏”。后来，一些党史研究者、回忆录中也零散地有所提及，但都只有一个梗概，没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几十年来，困牛山当地群众始终保持着到红军跳崖处祭奠红军英烈的习俗。

2001年，刚调到石阡县党史部门工作的杨又铸倒然在零散史料中看到“困牛山红军跳崖”的只言片语，心中满是震撼与疑惑。为了深挖这段历史，他四处打听，终于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石阡龙塘有个困牛山，那里发生过战斗，当地有红军跳崖的故事流传。

被红军跳崖壮举感动，从2002年年初开始，杨又铸带着调查组走遍困牛山的角落。在20多年的走访中，蔡应举、滕久全、安天明、姚祖华、张善明等八九十岁高龄的见证者向他回忆：“那天，我们听到黑漆河沟里枪声响”“首长被打死，红军战士放声大哭”“跳崖的净是些十七八岁的娃娃”。

“那么多红军牺牲在石阡，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为了深入考证，杨又铸多次到贵阳，请来党史专家帮忙搜集资料。“我在石阡调查，省里专家帮忙完善资料，有的专家甚至还跑到北京中央博物馆帮忙找资料。”杨又铸说。

在实地考证和群众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中，尘封几十年的历史越来越清晰。2002年11月，《关于困牛山百余红军集体跳崖壮举史实调查报告》的考察论证会召开。2009年，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落成。2016年，龙云被追认为烈士。

20多年来，全省各级党史部门上下联动，持续推动困牛山战斗以及红军集体跳崖壮举的研究成果不断深化。

2021年，困牛山遗址列入遗址类别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内容；2022年筹备“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专题研讨会期间，铜仁市、石阡县党史部门查阅档案资料3.55万卷，收集书籍10余册（本），访谈30余人次，函询外调15次；2025年，石阡县甘溪困牛山红军烈士陵园入选第七批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2026年，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困牛山战斗遗址雕像。夏磊 摄

乌蒙山回旋战，绝境闯生路

文/图 本报记者 黄若佩

乌蒙山深处的赫章桃园大垭口，哲庄坝红军战斗遗址纪念碑静静矗立。碑前，一张乌蒙山回旋战行军路线图上，箭头忽而向西、忽而折南、忽而掉头向东，在赫章、威宁、镇雄、镇雄等地反复穿插。

“我们所在的位置两边低中间高，敌人从赫章方向过来，红军就在这里拦腰截断。”赫章县红色资源管理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侯欣指着地图向记者介绍，“就在这里红军打响了哲庄坝伏击战。”

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在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一带创建根据地，将介石调集重兵四面压来；三个纵队转到东南断断南下安顺之路，万耀煌纵队尾追而至。2月下旬，红二、红六军团撤出毕节，西进乌蒙山。

乌蒙山横跨黔西北与滇东北，山高谷深，人烟稀少。时值冬春之交，雨雪连绵，山路泥泞，10余万敌军正从四面合拢。3月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在赫章野马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赫章、威宁、镇雄、彝良、昭通一带与敌周旋，寻机歼敌。

3月6日至7日，红军进入云南彝良奎香一带，探出北渡金沙江的姿态。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急忙赶头西北，樊嵩甫第二十八师步步紧逼。3月7日夜，贺龙率红四师、十六师、十七师从奎香折返50里，埋伏进以剿河以北山地。天没亮，战士们冷得发抖，为不暴露不敢跺步，只能静候。8日拂晓，敌二十八师先头两个连走进伏击圈，三个师一齐开火，毙伤俘敌数百人，使敌人不敢轻易犹进。

最终，跳崖者中只有少数被刺蓬阻挡，为当地百姓所救；而龙云率部突围后，又遭阻击，负伤被俘。敌人得知他是红十八师师长，先后将他押往贵阳、长沙、九江、武昌进行轮番折磨，但是龙云始终坚贞不屈，于1936年在湖北牺牲。

硝烟散去，但困牛山下的故事，仍在继续。

“关于困牛山战斗的记载，最早见于1934年10月19日的一份旧政权档案——《黔军军部皓电川岩坝战况通报》（困牛山属于川岩坝地境）。”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姚媛媛告诉记者，据档案记载，红军“顽强抵抗，冲锋十余次，全用肉搏”。后来，一些党史研究者、回忆录中也零散地有所提及，但都只有一个梗概，没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几十年来，困牛山当地群众始终保持着到红军跳崖处祭奠红军英烈的习俗。

2001年，刚调到石阡县党史部门工作的杨又铸倒然在零散史料中看到“困牛山红军跳崖”的只言片语，心中满是震撼与疑惑。为了深挖这段历史，他四处打听，终于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石阡龙塘有个困牛山，那里发生过战斗，当地有红军跳崖的故事流传。

被红军跳崖壮举感动，从2002年年初开始，杨又铸带着调查组走遍困牛山的角落。在20多年的走访中，蔡应举、滕久全、安天明、姚祖华、张善明等八九十岁高龄的见证者向他回忆：“那天，我们听到黑漆河沟里枪声响”“首长被打死，红军战士放声大哭”“跳崖的净是些十七八岁的娃娃”。

“那么多红军牺牲在石阡，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为了深入考证，杨又铸多次到贵阳，请来党史专家帮忙搜集资料。“我在石阡调查，省里专家帮忙完善资料，有的专家甚至还跑到北京中央博物馆帮忙找资料。”杨又铸说。

在实地考证和群众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中，尘封几十年的历史越来越清晰。2002年11月，《关于困牛山百余红军集体跳崖壮举史实调查报告》的考察论证会召开。2009年，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落成。2016年，龙云被追认为烈士。

20多年来，全省各级党史部门上下联动，持续推动困牛山战斗以及红军集体跳崖壮举的研究成果不断深化。

2021年，困牛山遗址列入遗址类别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内容；2022年筹备“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专题研讨会期间，铜仁市、石阡县党史部门查阅档案资料3.55万卷，收集书籍10余册（本），访谈30余人次，函询外调15次；2025年，石阡县甘溪困牛山红军烈士陵园入选第七批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2026年，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員会布告（第四号）》。
毕节市史志办供图

『当兵就要当红军』，贵州扩红七千余人

本报记者 黄若佩

在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百花路19号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展厅中，见证红二、红六军团在黔西北开展扩红工作的一台老式石印机静静陈列，这台设备为红军当年向当地征用印制革命布告、宣传标语，传播革命主张、唤醒穷苦群众。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开始长征，兵力17万余人，历经多场艰苦转战，部队减员明显，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红二军团五师十四团建制一度空缺，兵力补充成为部队存续突围的关键。

据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一级巡视员覃爱华考证，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的扩红历程可分为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为1934年5月至10月黔东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扩红2000余人；第二阶段为1934年10月至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转战贵州，累计扩红7000余人。

早在长征之前，贵州大地便已播下革命火种。1934年5月，贺龙、关向应、夏曦率红三军挺进黔东，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当地“种兵”武装改编为黔东纵队，沿河、印江、德江等5支地方独立团相继组建。至10月印江木黄会师前夕，红三军在黔东扩红2000余人。印江木黄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为红二、红六军团合编长征筑牢根基。

1936年1月12日，红二、红六军团攻占石阡县城，开启出征两个多月来首次长时间休整。其间，红军组织群众打土豪、制军装、备干粮，组建12支地方游击队，吸纳800余名青年入伍。1月19日的石阡会议决定放弃就地建立根据地，挥师西进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

1936年2月初，红二、红六军团伴攻贵阳、调动敌军，趁势强渡鸭池河，进入黔西、大定、毕节地区。2月8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定成立，黔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大规模扩红工作全面铺开。

“毕节扩红效果突然，5000余名各族青年踊跃参军。”毕节市史志办地方志编辑科科长田平介绍，早在1934年1月，林青、邵正元、秦天真就在毕节创办进步社团、建立地下党支部，传播革命新思想；此后中央红军过境播撒革命火种，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长期在此坚持斗争，让当地百姓早已熟知红军宗旨、心生向往。

立足根据地，红军发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第四号）》，推出7项施政方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废除苛捐杂税等。同时以石灰、红土涂刷通俗革命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惩治恶霸、均分浮财；文艺宣传队编排鲜活活报剧、传唱《当兵就要当红军》等革命歌谣，让革命理念深入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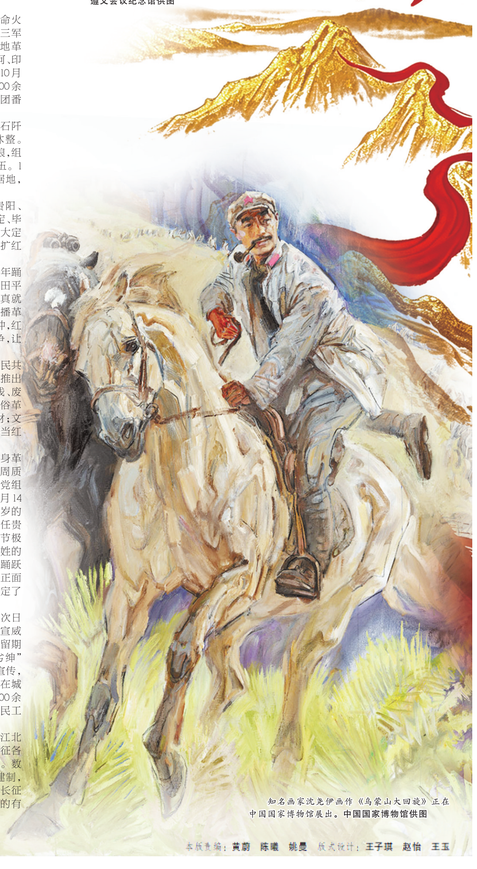
争取地方进步武装、吸纳开明人士投身革命，是此次扩红的一大亮点。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率领的3支地方武装，经地下党组织争取整编，合计3000余人。1936年2月14日，以此为基础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57岁的贵州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欣然接受邀请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周素园当时在毕节极有名望，他主动参加红军，打消了众多百姓的顾虑，带动大批开明人士拥护革命、青年踊跃入伍。同时，他致信滇军将领不要与红军正面对抗，为红军取得乌蒙山回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田平说。

1936年3月28日，红二军团攻占盘县，次日红六军团摆脱滇军补渡纵队追截，从云南宣威经平彝过胜境关进入盘县亦资孔。盘县停留期间，红军书写“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抗日必先反蒋”等革命标语，编演活报剧宣传，组织“抗日救国义勇军”和“抗日大同盟”，在城关及土城、亦资、火铺东哨等地扩充红军700余人，其中有400多名正在修筑滇黔公路的民工集体参军。

3月底，部队在盘县召开会议决定渡江北上，最后抵达陕甘时仍保有万余精锐，是长征各主力部队中保存有生力量较为完整的一支。数千贵州子弟的热血加入，不仅补齐了战斗排制，为红二、红六军团保存有生力量、胜利走完长征路筑牢了底气，更为中国革命留存了珍贵的有生力量。

红军在遵义扩红后发给家属的优待证。
遵义会议纪念馆供图

哲庄坝红军战斗遗址纪念碑。



知名画家沈龙伊画作《乌蒙山大回旋》，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胡昊 版式设计：王子琪 赵怡 王玉